

代表委员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两会聚焦

参政议政

钱包鼓了 为何心理还不平衡

本报记者 徐蕾 赵晓霞 邹雅婷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可是有关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钱包鼓了,为何百姓心里还不平衡?就此,记者采访了部分代表委员。

蒋跃新作 (新华社发)



生活水平提高了,差距也扩大了

人们比过去富裕,为什么心里反倒更不平衡了? “这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扩大越来越突出;二是现在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社会关注。因此,全社会对收入分配的改革有着越来越多的期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存在明显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表示,对于企业而言,国家规定了最低工资以保障雇员基本利益。“但是企业中有国企和央企,在垄断性行业的国企、央企里,员工普遍收入高,领导的收入就更高了,一些老总年收入动辄几百万元。还有,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明文规定的工资是很少的,但其他‘隐性收入’较高。这种高收入很容易引起社会其他群体的不满。”

希望政府大力发展农村产业

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话题,来自西部农村的代表有更深切的感受。“部分人的富裕掩盖了贫穷问题,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县长韩永东是土生土长的撒拉族人。他直言,媒体现在多数关注的是城乡收入差距大。其实,

收入分配改革还要多重视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 “目前农村村民的收入主要是财产性和货币性的,产业性的收入也就是经营性收入占有的比例很低。事实上,产业性的收入是最稳定的,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够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对于缺乏劳动力的弱势群体应加大货币性的补给。”韩永东说,“他们的生活负担非常重。”

尽快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其实,政府非常重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并着手逐步解决。日前,国务院已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是一个顶层设计方案,具体可以从哪些方面破题? “收入分配改革关键是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讲了也是白讲。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宏大的命题,其中就包括国企改革,打破垄断。我们现在的体制,今天是政府官员,明天就是国企老总,国企改革关系着他们的切身利益,怎么改是个问题。”黄泽民直言,“经济体制改革之外,还要使收入分配透明化,接受民众监督。” “居民收入的调节可以从税收方面着手,加大对

高收入者的征税,转移支付给低收入者,对中低收入群体减税,缩小收入鸿沟。”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湖北省委副主委杨占秋说。

迟福林多年关注收入分配改革,他表示,虽然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已出台,但能否在实践层面有效缓解并抑制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仍面临某些重大挑战。

“我建议,首先要尽快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突出问题。要在群众热议的垄断行业收入、国企高管薪酬、某些地方公务员福利过高等问题上,尽快提出务实的行动计划;其次,明确提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行动计划。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大,是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的基础,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国民收入倍增的关键是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需要尽快制定并出台结构性改革方案;第三,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当前,到了下决心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时候了。”采访中的代表和委员们纷纷表示。



图①: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张泽熙(左)展示手机中的调研资料。本报记者 魏本貌摄

图②:3月4日,濮存昕(右)向关峡委员介绍他关于保护长江江豚的提案。

图③: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张光军在小组讨论时对委员们做好提案提出建议。

图④: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邵丽华的手语发言赢得了现场的一片掌声。

图⑤: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赵家军在小组讨论时发言。



两会行走

“钱学森之问”,不能只问学校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教育是民生问题,大家都关心。但不能总是指责教育,说教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也该说点话。”3月4日下午,全国政协教育界别的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郭大成希望要“给教育一点空间”。在进一步解释自己的观点时,他提到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这个话题出来的那段时间,矛头多对准学校,认为是学校没办法,培养不出人才。但一个人才的成长,学校是基础,还需要家庭、社会等方面方面的支持,也包括学生自己的努力这个因素。在发言结束时,郭大成强调了一句:“不

能太急。”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元河表示赞同:“要培养大师,单靠着急是不行的,越着急越不行,需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情。” “刚才郭委员的这个观点您怎么看?”话题延伸到了会议室的楼道里,几位记者围住了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他语速极快地回应:“‘钱学森之问’,可以问,但不能只问学校。” 葛剑雄认为,就拿钱学森的成功来说,也并非仅由一所学校造就,而是整个社会的产物。“所以说,教育问题,不是简单的学校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来努力。”

袁隆平:

粮食安全 是我的“中国梦”

新华社记者 孙铁翔 刘景洋 李云路

“我感冒了,希望大家不要选我,别影响了工作。”4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无党派人士界别小组讨论推选组长前,多次担任组长的全国政协委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一番话,引来大家一片掌声。 话如其人。严谨、求实,这是袁隆平一生坚持的风格。 会间休息时,有人提起台湾农业问题,立即引起袁隆平的兴趣。 “我们与台湾在农业方面互有优势,台湾园艺业比较强,水稻技术我们领先一些。”袁隆平说:“目前我们和台湾在杂交水稻方面还没有合作,也没有正式交流,希望能和台湾加强农业合作,有机会再去台湾走走看看。” 袁隆平说:“我有两个梦:一个是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帚那么长、籽粒有花生那么大。一个是希望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能尽快实现。这就是我的梦——粮食安全的梦。”说话间,袁隆平有些兴奋,仿佛已经看到了眼前的“中国梦”。

“最炫两会风”

本报记者 张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副主席王荣宝在4日的小组讨论中用歌词做了开场白:“我在来北京的飞机上听到了一首歌,是根据《最炫民族风》改编而成的《最炫两会风》,歌词很令人振奋。比如,‘勤俭和节约是我的爱,委员和代表从四方来’,‘没有了迎送和那宴席开,火辣辣的发言是我们的期待’。” 在接下来的发言中,王荣宝也很给力。她对目前的海外列席代表制度提出了完善的建议。她说:“海外列席代表的选择,应该在居住国、国籍地等方面都有所考虑。另外,应该选择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人员,组成一支相对固定的队伍。这样才能真正反映海外华侨华人的心声。” 她还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樱花提案”。她说,现在大家都喜欢去日本看樱花。但其实,真正的樱花品种源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重庆、昆明的樱花就非常漂亮。樱花是一种花期长、成本低的绿化植物,完全可以成为“美丽中国”的一部分。她建议有关部门重视我们的樱花产业。“我们应该吸引日本人来中国看樱花,而不是中国人跑到日本看樱花。”她的发言的确让人感受到了一丝“火辣辣”。

我当农民工代言人

薛志国



薛志国

当初只想打工挣点钱,从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以农民工的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两会。刚当选时,我很快意识到,这一身份更意味着责任。两会前夕,我到北京一个劳务市场向进城务工人员了解情况,人们一下子涌了过来,黑压压一片,争相向我倾诉他们的心里话。

为了履行好这份职责,当好农民工的代言人,我参加人大代表培训班,学习了解代表履职的责任和义务、途径和方式,与更多的农民工朋友聊天,了解大家的生活情况、存在的困难并形成意见和建议。虽然个人的力量很微弱,但我一定努力把农民工的心声带到人民大会堂。

过去,人们主要关注农民工权益保护,不过,我通过调研发现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前两天,我在北京的一家工地上调研时,以前经常出现的工人诉苦不见了,得到的回答绝大多数是吃住和工作条件正在改善的好消息。同时,农民工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社会保险、子女入学等等。

我所在的保安公司仅望京经理部就有6000名保安,随着农民工群体的壮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但目前农民工子女接受的义务教育远远不能和城市同龄孩子接受的教育相比。几乎所有的农民工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就近入学,但实际上,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的隐形排斥依然存在,比如,一些优质学校往往要“择优入学”或者是变相收费,而专门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普遍存在办学条件差、教师学历层次较低、师资队伍不稳定等问题。

教育公平是最大的社会公平,决不能让农民工的后代输在“起跑线”上。我认为除了鼓励城里学校向农民工子女敞开大门,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制度上想办法。比如,中央应考虑调整相关的政策措施,尽快建立公平合理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这样才能调动流入地政府积极性,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

(本报记者 贺勇整理)

链接

48岁的薛志国是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古鲁板蒿乡的一名农民。1995年,他来到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怀柔分公司从事保安工作,摸爬滚打,一干就是17年,如今是怀柔分公司望京经理部经理。2004年,薛志国主动向赤峰市党组织和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道党工委提出申请,经批准成立了赤峰市驻北京怀柔区流动党支部,薛志国担任书记。2013年1月,薛志国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代表委员新面孔